

世界往那里变动

華北新學堂出版

國際問題參攷資料第二輯

世界往那裏變動？

目錄

世界往那裏變動？.....	Palme Dutt著。鄒彥譯
蒲恩茅斯會議後的展望.....	Harry Pollitt著。湯生譯
歐洲的選舉.....	William Rutt著。湯生譯
第二次歐戰勝利後的德國勞工運動.....	Hans Berger著。尼銘譯
美國九月份讀者文粹雜誌新聞信.....	康牧譯

世界往那裡變動？

Palme Dier 著
那 彦 譯

本文作者杜德是英共領袖，曾任英共總書記，現任中委，勞動月刊總編輯，舉世聞名的政論家。本文譯至去年四月份勞動月刊。

人們正在紛紛地議論着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必須冷靜地，客觀地，現實地，權量一下世界的現勢，和那些有意無意走向一個或近或遠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因素，以及阻止這樣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與條件。第三次大戰的口號，是在這次戰爭的結束階段，由納粹喊出來的。所有納粹與法西斯份子，佛朗哥的長槍隊，安德斯的波蘭軍，南斯拉夫的保皇黨，以及同樣在歐洲坍了台的反動派都公開地懷抱希望，願望於這個戰爭。他們急切地投機於假設的英美與蘇聯之間「不可避免」的，即將到來的戰爭，把它看作是反革命復辟的信號。這種投機會經得到爲邱吉爾在福爾敦的演說，英美報紙上許多的言論，以及外交政策上的某些趨勢的大大鼓勵。

同時，我們不應該允許這些在社會上沒落了份子用粗魯的，魔法師的合唱造成一種誇大他們力量的觀念，或者製造出一種神經的催眠使人相信第三次大戰的假設不可避免。這些投機家忘記了戰爭必需要軍隊來打，要軍火來支持，而英國工人不會那麼輕易

地被拖進他們的如意算盤，爲反對蘇聯而戰爭，或者製造軍火。在反納粹戰爭勝利了的今天，全世界民主陣營的力量如果還徘徊着一個正權的政策是有充分力量足以防止第三次大戰的。佔有壓倒優勢的人羣正以極大的恐懼來展望第三次大戰的遠景。如過去經驗所示，只有這些本能的排拒和主觀的願望還是不夠的，必須把它變成主動聯合的行動，而這行動應當以清楚地了解到維持團結，擊敗反動的好戰份子，以及在世界史的現階段中阻止戰爭的種種必要條件爲基礎。我們在一九四六這戰爭結束納粹敗滅以後的第一個建設的年度內，所作的決定和行動，尤其是關於英美蘇三國關係的部份，勢必支配未來的若干年代。

很久以前，還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正當「以戰制戰」和資本主義內部「永久和平」的呼聲高唱入雲的時候，列寧就指出了如果人類不能從第一次戰爭中獲得教訓，第二次戰爭即隨之而至。這直到現在，還是完全真確，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條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無法解決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地孕育着戰爭，而任何關於資本主義內部永久和平的美夢，不論你是用什麼機構，都是危險的，削弱鬥志的幻想。但是列寧並不是鼓吹着不可避免要發生一系列戰爭的教條，相反地他正指出了工人階級和人民反帝國主義戰爭，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道路。馬克斯主義總是告訴我們說，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力量足以制止一個嚴重的戰爭威脅，並且從這一成功，更可有力的制止較遠的戰爭威脅，同時在這鬥爭之中，在這時間之內，能夠增加達成消滅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這一最後目標的力量。也祇有根除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才能最後地消除戰爭的根源。

一九一四年以前，舊社會主義國際曾經設法組織工人階級以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二一年的巴爾宣言 (The Biele Manifesto 1912) 全然清楚，具體而詳細地

概述了即將到來的戰爭底性質和行將隨之而來的革命的後果。當時雖然還沒有必需的力
量、團結和領導來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第一次大戰的革命後果却是這樣的重大，
以至在第二次大戰的前夕，情況已有了極大的改變。誰都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差不多
是可以不費力地阻止得了。如果蘇聯和西歐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所倡導的「西方列強與
蘇聯的聯合和平陣線」政策得以實現，第二次大戰就絕不致爆發。這政策之所以失敗，
完全是由於慕尼黑份子的作用和西歐社會民主黨反對工人階級的團結、反對人民陣線而
給予他們的助力。

今天，力量的對比是改變得更多了。法西斯主義的敗北，蘇聯的世界性力量的增強
，工人階級的力量，組織和團結的進展，歐洲若干民主政權的建立，殖民地人民在爭取
獨立上所取得的進步，以及聯合國的形成，都部份地反映了這新的力量的對比。今天的
形勢實在更加有利於阻止第三次大戰。但是要走向這一工作，我們必須仔細地研究引起
第二次大戰的具體條件，以免重犯錯誤，以便於我們推行配合今天新形勢的政策。

為什麼第一次大戰之後就緊跟着第二次大戰呢？這個總的答案，充份顯示在帝國主
義內在的諸種條件中——生產力的進展和獨佔資本的限制之間，嚴重的經濟矛盾。這表
現於世界的經濟恐慌，也表現於為重新分割世界而起的尖銳鬥爭，特別表現於德日意三
大擴張性帝國主義國家向擁有殖民地的列強的挑戰。這些都反映着帝國主義間正常的鬥
爭正朝着戰爭發展。並且在一個更高度的階段中重產生了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老花樣
。可是，在這第二次大戰當中却加入了一個新的因素，對於戰爭的性質具有決定性的作

用。這個因素正符合於世界歷史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是以資本主義的普遍恐慌，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次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在俄國的建立，以及在發展着的社會恐慌和統治階級用法西斯主義殘暴地摧毀工人階級運動，民主運動及蘇聯的條件之下，工人階級的條件開始的。就是這個新的因素支配了走向第二次大戰的歷史過程，並且支配了它的決定性的性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決定性地不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貫通着並且支配着帝國主義間相互鬥爭的老調。第二次大戰自始就發展成爲一個人民解放戰爭和蘇聯同一步調反對法西斯主義。從發動伊始，從戰爭的最早期階段，從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戰爭，從阿比西尼亞人民反抗意大利法西斯的戰爭，以及從在國際縱隊及蘇聯支持之下反抗德日法西斯的西班牙內戰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這種決定性性質早就顯示出來了。

所有帝國主義者反對的努力和政策都不能取消這次戰爭的反法西斯的性質，不僅是支持日本和培植德國法西斯主義及其重整軍備的政策不可能，不僅是慕尼黑及其孕育的以德意法西斯來對付蘇聯的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不可能，即使是由張伯倫和達拉第所造成的以反共反蘇爲主要任務，以一無聊的戰爭一來和希特勒相配合的這次戰爭的帝國主義的一面也同樣不可能改變歷史的主流。這一系列的政策都給英法及歐洲的人民帶來了致命的後果。而這後果却相對的促成了接受過去曾經反對過的英蘇聯盟的必然性。同時最後建立了帶來法西斯軍事崩潰的『聯合國』組織。所以正是在這次反法西斯的解放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的果實與收穫，我們必須加以維護和發展，決不能允許引向第二次大戰的那些不幸的政策重新出現。

假如我們要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於引向第二次大戰的這些不幸的自殺性的政策所給我們的教訓必須認識清楚，永遠記住，並且應用到今天的實踐中來。在擊敗了德國並毀滅了它的海空軍以及大砲和坦克以後，在以凡爾賽條約加於德國頭上並且禁止它重整軍備的情況下，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却立刻進行着重建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力量，撕毀凡爾賽的條文，准許甚至協助它重整軍備，一直到在二十年後，德國帝國主義足以用比一九一四時更可怕的武裝力量來重新威脅這個世界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人人人都明白的。這正是西方列強反蘇的敵對行為，對於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的恐懼，以及西方列強和蘇聯之間的分裂這一些因素奠定了德國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再起的基礎，鋪平了法西斯侵略的道路，破壞了國際聯盟的組織，最後帶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正是這面「反共產國際」的旗幟為法西斯匪徒製造了他們的口頭禪和敲門磚，藉以掩飾他們的侵略，鎮壓，破壞和兇暴，並且藉以誘詐西方的帝國主義者而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端。而在這面「反共產國際」旗幟的背後却聚集了無數的罪惡與侵略。然而，你能相信麼？經過了這許多年的屠殺今天還有人在嚷着要把這一而可恥的旗幟重新樹立起來！

難道我們還要眼睜睜地重蹈覆轍不成？在戰爭的檢討之中，英國統治階級的政策在「反布爾塞維克的誘餌」之下所犯的嚴重錯誤是必須承認的。這不僅為評論家所承認，亦為統治階級的官方代表所自認不諱。外交部次官勞氏（R. K. Loe）一九四三年一月在議院裏就這樣說：

「在上次大戰和這次大戰之間的二十年中，德國利用大家對布爾塞維克的恐懼而大

玩花樣。這就是何以它能如此之久不受阻攔的原因。」

同時「泰晤士報」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的一篇社論裏也這樣說：

「常常聽人提到在一九一八的悲劇以後德國軍國主義之依舊存在是希特勒所賴以建立的主要基礎之一。可是却比較不常聽到人們提起當時協約國由於不容許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冬季德國的革命運動，而不知不覺地縱容了這個「復興」，而「恐懼布爾塞維克的狡詐宣傳正是迫使他們縱容的力量。」

「魔鬼病了，和尙就是魔鬼呢。」揚言着全世界共產黨都是文化與和平的威脅的希特勒的狂吠依然嗚嗚在耳邊，難難者的鮮血還在濡濕着大地，僅僅在戰爭結束後的九個月之內，戈培爾的衣鉢已經爲我們的勝利者繼承下來了。我們聽見邱吉爾正吶喊着：「共產黨構成了對基督教文化不斷的災害和挑戰」，也聽見貝文對「聯合國」組織宣佈：「對世界和平的危機」是產生於「在各個國家的共產黨」，道路究竟引向何方，歷史已經指示給我們了。

紅衣主教葛里芬 (Cardinal Griffin) 在威斯特敏斯大教堂裏最近的一次演說曾經鄭重地宣佈，今天世界的形勢「較慕尼黑時代還要險惡」，「今日世界乃在一個比慕尼黑以前還要險惡的狀態之中」。他和他的同類——自然會覺得「較慕尼黑還要險惡」，因爲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愉快合作的時代過去了，偉大的反蘇十字軍運動的希望幻滅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經入土，蘇維埃聯邦已經空前地強大，同時歐洲的人民都已起來肅清法西斯的渣滓而自己掌握一切了。所以無怪乎他和他的一夥今天滿懷憤傷了。可是這還不是他真正用意的所在，他和與他類似的成千的宣傳者，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 B. C.)

在內，都在企圖把『慕尼黑』和『綏靖政策』可恥的回憶重新翻出來，而同時却故意暗示與蘇聯友好的政策就是『慕尼黑』，與蘇聯合作就是『綏靖』。這正是一個陰謀的兩面政策。『慕尼黑』和『綏靖政策』的本質就是對蘇聯的敵對與對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而現在這些『慕尼黑』、『綏靖政策』的兩面政策者，就是想利用一般對『慕尼黑』、『綏靖政策』一段歷史的憤慨情緒，來重復他們造成敵對蘇聯支持親法西斯的陰謀。這種露骨的兩面政策的陰謀顯然是欺騙不了多少人的。

一九三九的春天，斯大林就警告了在什麼地區這種西方帝國主義的策略在進行着。在頗有人企圖在新形勢中使舊陰謀復活的今日，把他的警告回憶一下是很有價值的。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全會席上，他這樣說：

『這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有一個特色就是它還沒有變成一個全球性的——一個世界戰爭。戰爭正由侵略國家在發動，它們在每一種形式之下做着侵害非侵略性國家利益的事情，主要是侵害英國，法國和美國；而後者呢却步步後退，事事萎縮，對侵略者，一個讓步接着一個讓步。』

那末，我們把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這種一面倒的新奇的性質歸根於什麼原因呢？

他用對『不干涉』政策的重要性的說明回答了上面這個問題。

『不干涉政策顯示出一種不願阻止侵略者進行其罪惡的行爲的渴望與要求。比如就不去阻止日本陷入對中國進行戰爭，或者更進一步對蘇聯戰爭；不去阻止德國落入歐洲事件的網中，也不阻止其對蘇聯進行戰爭，反而讓所有這些好戰國家深深地陷於戰爭的

泥淖之中，並且暗地裏在這方面給它們以鼓勵；想藉以讓它們彼此削弱與消耗，然後等到它們都變得相當衰弱的時候，再以嶄新的力量出現於舞台上，而且當然是爲『和平的利益』而出現，向已衰弱了的好戰國家提出條件。』

他在結論裏提出一個著名的警告說：『由不干涉政策的支持者所創導的一個巨大而危險的賭博，可能最後在嚴重的失敗中結束。』當某種類似的趨勢正重新出現於新環境之中的時候。這樣的剖析的確是值得我們銘記腦中。因爲在這個分析之下，西方帝國主義者最反動的部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至於今天所扮演的一切，都無可躲閃地原形畢露了。

當英國的統治階級發覺他們已經面臨如斯大林預言的失敗，結果造成了希特勒對歐洲大陸的統治以及他們自身的危機的時候，他們及時地接受了他們前曾反對過的英蘇同盟的政策。這一個措施已證明是這次戰爭的轉捩點並且成爲對希特勒最後勝利的基石。對於這個符合於英國人最大利益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功勞是屬於邱吉爾的。不過這並不是說邱吉爾（他自己當時也是終費苦心的）或是英國的統治階級改變了他們對蘇聯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也不是說他們是帶着同樣的鼓舞人民的反法西斯觀念在戰鬥。

在戰時，英帝國主義追求着一個雙重的目標。在官方的表示當中，這是淡淡地被掩飾着的，可是不僅在非官方的表示裏，而且在戰爭中的實際戰略以及與之配合的幾次英美外交會議裏，這個目標却顯然可見。一方面，西方帝國主義者，在與蘇聯聯盟之下，要求確保希特勒的敗北，而另一方面，他們却担心法西斯主義的崩潰會造成共產主義的發展，或者使在歐洲普遍的反法西斯革命危及舊的社會秩序，或者使蘇聯力量加強。

們預料戰爭的壓力將不僅使希特勒歸於毀滅，而且將同樣地毀滅，或者致命地削弱蘇聯，於是英美力量就將以主要勝利者的姿態出現，來管理歐羅巴洲而君臨天下。

西方帝國主義在戰爭的這種雙重目標的戰略，在現在更充分的事實印證之下，對之剖析與回憶實有異常的重要，因為它對目前反動趨向所起的作用已經公開了。這樣的戰略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的『勞動月刊』上論到統治階級政策中的反動趨勢時就被完全揭穿過：

『在當他們的行動可以對共同目標有決定性的助力的緊要關頭，他們便保持英軍的不干預與休止的狀態，他們竟公開地打算要在以後生產力達到最高峯，而東戰場雙方戰鬥力量都已達到精疲力竭的時候才插足進來，然後可以確保英美在歐洲的霸權以及法西斯崩潰以後舊秩序的保留。這簡直是新慕尼黑主義。』

這箇錦囊妙計在政府部長卜巴崇 (Moore Brabazon) 一次有名的失言中，天真而公開地顯示出來了。根據電氣工人聯合會 (Amalgamated Electric Union) 主席在職工大會上所作的，未被否認的摘要，我們知道這位部長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卅一日的一次私人集會席上，發表了這一談話的，當他說明了他『很高興今天沒有記者在座』以後，他就表示他的：

『希望，蘇軍和德軍將互相消滅。當這正在進行中的時候。我們大英帝國，將盡量發展我們的空軍以及其他的武裝力量，假如蘇德兩國真的互相消滅了，那我們在歐洲就有獨霸的力量了。』

這位天真的卜巴崇其實也不過道出了最高當局的妙算，然而竟因為洩漏了這個天機

而丟了官。官方的憤怒，又轉而加諸於報導這一私人集會的『違法』。並且用和緩的口吻解釋這位部長那天的演說沒有帶草稿，只是隨便想想的。正如蓋拉邱 William

Callacher M. P. 所說：

空軍器材生產部長已經就他的演講作了一個聲明，這次是即席隨口演講，他並沒有想到他要講些什麼。但是正因為他沒有想到他要講些什麼，他的心底深處想法流露出來了。』

這種兩面的政策在這次戰爭的戰略中有實際的表現。這次戰爭的戰略的指揮原則就是把主要壓力要用於蘇聯。在政府圈子裏，原來大家都預言着納粹的攻勢打跨蘇聯只是幾個星期的事情，或者至多也不過幾個月功夫。當歷史上最殘酷猛烈的軍事進攻加諸於紅軍的時候，沒有一個英國軍隊在任何戰綫上有所行動。邱吉爾與羅斯福正相會於大西洋上，並且同時參與了一個特別選擇了『前進啊，基督天兵』作為聖歌的神聖的禮拜。（當蘇聯和中國的士兵正在火線上以寡抗衆的時候，只有基督天兵並沒有參與。）『前進啊！基督天兵，前進像去戰爭！』（妙在『像去戰爭』四個字。）

當蘇聯完全出乎西方國家官方的意料而抗拒了這個猛攻，（如邱吉爾所說的『沒有敢期望的，沒有夢想到的！』）當蘇聯第一次的反攻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季發動了並且期望着西方有配合行動的時候，當莫洛託夫來到了倫敦，正式要求在西方的平行動作的時候，決定在一九四二年開關第二戰場的保證才被提出。可是這個保證却被傳辱了，而且其後簡直成了一張紙牌而已。納粹對蘇聯進行了整整三年的功夫，當所有的學者都衆口一辭地寫着希特勒的致命要害就是在歐洲蒙受兩線戰爭的時候，西方的第二戰場延擱

了，並且一直拖到了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整整的三年功夫，蘇軍只能單獨地承當着納粹大軍的主力。

所有表達官方意思的空談清客，都把輕蔑加之於共產黨要求西方第二戰場的言論，並且嘲笑著，顯然的，只要是軍事專家就能判斷明白何者最佳的時候，還敢於插足於戰略問題的『紙上談兵的戰略家們』。可是今天這些空談清客們却顯得夠愚蠢的了。在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副官博喬上尉（Captain Butcher）所寫的回憶錄裏，就表示出艾森豪威爾將軍和他的軍事專家們都是贊成第二戰場在一九四二夏季開闢的。反對的力量主要的不是來自軍事方面而是來自政治方面。而阻礙並且拖延了第二戰場的決定性的反對力量是來自——當時這是不許說的——邱吉爾。當邱吉爾停止在一九四二開闢第二戰場的決定送達了艾森豪威爾的時候，艾森豪威爾把它呼作：『這次戰爭最黑暗的一天。』

這個決定延長了戰爭。正如馬德爾將軍（General Sir Gifford Martel）在他著的『我們的裝甲部隊』（Our Armoured Forces）裏所說的：

『在英格蘭的軍隊早在使用他們一年以前就已經準備好了。他們到一九四四的時候幾乎已經變得陳腐了。假如我們早一點決定了大計，是不是能早就定局了呢？』

蘇聯承擔了這次戰爭的主力，整整三年的功夫單獨地對付了四分之三的納粹軍力，在英美於最後階段在西綫插足進來共享勝利之前，它已經付出了驚人的代價粉碎了納粹。這個代價表現在它戰爭損失的可怕的數字裏。蘇聯失去了七百萬生命。而英美損失的總數却為高尙的發言者在上議院裏的交通問題項下，拿來與平時的道路死傷數相對比。

這個同樣的兩面政策也表現在這次戰爭的外交圈內。英美之間的外交會議總是在三
 險會議之前或是分開來舉行，而且隨着戰爭的進展，一天天更明顯地涉及到法西斯主義
 崩潰後在歐洲如何維持舊秩序的問題。簡直是對於加拿大間諜的一個側面諷刺。因為據
 說邱吉爾與羅斯福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兩次在魁北克舉行的秘密會談與計劃可能已為斯
 大林所知，竟引起最大的驚慌：

請看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倫敦每日電訊報：

『對加拿大間諜案之興趣今日均集中於供認羅邱於魁北克會議秘密討論之詳情由於
 在沃太華之洩漏而可能業已傳至莫斯科矣。』

此間官員當憶及一九四三年之魁北克會議，包括對斯大林元帥對第二戰場問題的所
 施壓力之詳細討論時，均深感不安。

『在一九四四年的第二次會議，論及保證在解放後的歐洲，實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之
 戰後計劃。』

我們都還記得在第二次魁北克會議裏，如邱吉爾後來所宣示的，就已經決定了在德
 軍離去之後即插足到希臘境內推翻其『民族解放運動』。

在戰爭後期，當蘇聯不可摧毀的力量已為世人所共知的時候，他們就認為在政策上
 勢必有所修正，並且認為當初以為蘇聯在戰爭結束時必然破碎而倒下的估計完全錯誤，
 同時絕對地必須承認戰後蘇聯同等的強國地位，三強合作的基礎必須加以維持以定戰後
 協調之基。這就表現在莫斯科，德黑蘭，以及克里米亞的協議中所作的保證，保證三強
 『在戰時以及在即將隨之而來之平時緊密合作』，『藉以在未來和平之時，保持並加強

使勝利成爲可能之目標與行動的統一」，並以「消滅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最後形跡」。這一系列的保證及其相應的莫斯科，克里米亞，和波茨坦的具體協議爲戰爭的和平與民主的協調鋪下了平坦與不可缺少的道路。

可是一旦戰爭的危機解除了，西方列強就破壞甚至拋棄了這些保證，造成今天重重的困難。代表着大不列顛，美利堅合衆國，和蘇維埃聯邦鄭重簽訂的德黑蘭和克里米亞協議曾爲三強合作奠定了基礎，曾經作爲和平的必要基礎以及「聯合國」機構成功的必要條件而爲戰後的世界確定了方向。反過來就必然造成敵對與鬥爭，兩強爲對付第三者的聯合，和均勢政治的全盤動搖。可是到今天官方的英國公報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美國政府公報却無恥地拋棄了這個三強政治的基礎。貝克(Noel Baker)在二月廿日下院裏就曾這樣代表政府宣佈：

「政府不同意在聯合國機構的議程上撤回某些重要的問題，而重新恢復三強政治來導致我們與蘇聯之間的和平與合作。」

同樣的，在波茨坦協議以及「消滅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之最後形跡」的執行中，我們都能詳細地舉出這種類型的破壞行爲。也正是這種破壞行爲，而不是對始終忠於克里米亞波茨坦協議的蘇聯政策所假想的什麼轉變，應當對眼前重重的困難負完全的責任。

究竟是什麼因素在戰爭的尾聲中造成了英美政策這一個危險的轉變——從三強合作的基礎走上了英美獨霸和製造反蘇的老路呢？顯然的事實告訴我們這個決定性的轉變乃是來自原子炸彈，以及對於權勢的迷惑，這種迷惑正是這新武器造成的，它使英美的戰

略家們和反動政客們的腦子裏都滿以為獨占了這個武器就可以完全使世界力量的態勢改觀，並且使得英美獨霸世界，反對蘇聯，反對一切高漲的民主勢力的計劃之復活成為可能。就如邱吉爾八月十六日在下議院的報告裏所宣示的：

「原子彈的使用是由杜魯門總統和我親自在波茨坦決定的。……就從那一刻起，我們對於前途的展望就已經轉變了。」

保持獨佔原子炸彈的決定無形中摧毀了合作信賴的基礎，隨着就是一個全面反蘇宣傳攻勢的開始。如同『觀察家報』(Observer)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所說的：

「關於英美兩國將不願洩露原子彈之秘密直至控制原子彈之方法出現於世之說法今又獲證實。此乃顯示世界列強關係之一大轉變，……將使英美兩國空前緊密地團結，……三強之均勢發生變化……原子炸彈的獨佔權在目前使英美集團的優勢成為事實。」

這就是造成戰略上迷惑的冒酒，它造成了英美獨霸世界的夢想的復活，並在當前國際局勢的不斷惡化中得到反映。直到自一九四五夏季以來西方國家發動的反蘇運動到達了頂點的時候，蘇聯才放棄了她對其西方盟國的行為保持忠實緘默的政策，而開始公開地代表全世界民主反法西斯力量給他們答覆。

在這一點上，我們很值得去回憶一下僅僅在一年以前，當納粹崩潰的前夕，戈貝爾為納粹主義所作的最後的演講。戈貝爾描寫了歐洲和德國將如何為英美與蘇聯所分裂，他又為東歐各地將被蘇聯在『鐵幕』後面組織起來而繪出了一幅遠景。(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個名詞——『鐵幕』，是首先由戈貝爾創造出來的，而今天却正為所有西方的反動政治家們包括邱吉爾在內那麼起勁地重複着。)他預言了這樣將形成英美列強與蘇聯

之間在第三次大戰中不可避免的決鬥。在這個基礎之上，他預見了納粹主義的捲土重來。假如我們要了解，今天在這許多國家內正在如此忠誠地遵循着納粹陰謀所定下來的原則，而推行着反動運動的真正重要性，對於以上這種納粹戰後策略的徵兆就必要加以密切的注意。這樣的趨勢，早在造成歐洲戰爭如此殘缺，甚至乖離的結束底曖昧的插曲中間始呈現出來了。——德軍在西線大規模地不戰而降，同時却在東線拚死命的戰爭，杜尼茲政府事件，違反波茨坦原則而對德國陸軍的組織繼續承認等等。

針對着這樣一個背景，我們就必需認識到邱吉爾在富爾敦的演說及其繼起的攻勢的重要性。已經落到地上的，浸透了罪惡的這一件『反共公約』的斗蓬又被檢起來，披到新的肩膀上了。被擊碎了的——：『基督教文化的十字軍』起來反對共產主義『威脅』和蘇聯的『擴張』的號音，今天又從新的嘴唇裏喊出來了。已經被時代淘汰了的希特勒，里賓特羅甫，以及戈貝爾的幽靈今天又重新行走起來了，在許多年中，在每一個卑劣而罪惡的世界侵略行為中，它們都已完成了它們的任務。戈培爾的帶着嘲笑的幽靈會對着他的新的繼承者而撫掌自得吧！

我們不難了解在失敗了的邱吉爾最後孤注一擲的一次十字軍後面所包容的憤怒。他最初企圖使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歸於破滅的願望，最後成了一個糜費而可恥的失敗，他戰前對日本的擴張，對墨索里尼、對希特勒，以致於對佛朗哥所加與的讚揚，舖平了引向這次戰爭的道路。可是，戰後的世界却並沒有變得如他所期望的那樣，蘇聯並沒有變成空虛而柔順，去向這個地球上的英美老閹們乞求垂憐，而是相反的，雖然有着可怕的嚴重損失，她還是依着復興建設的道路大踏步地向前邁進，在政策上她更是空前的毫無

畏懼，有力而自信。到反而是英美的資本主義一天天更明顯地面臨到重大的經濟問題了。整個歐洲並沒有聽從英美財政集團的命令；甚至法國也正依靠着共產主義而免於陷入西方集團的圈套。反動的被保護者都已經或是正在垮台了，米海洛維奇、巴多格里奧、達爾朗、彼德王、愛麥虞限王、利奧波德王……都到那裏去了呢？邱吉爾本人也已經爲英國人民所唾棄了，而在戰時三巨頭之中，只有斯大林繼續在團結起來的人民之中存在着空前的信心。這位失敗了的賭徒只有攤出了最後的一張王牌，那就是英美反動派的軍事聯合來對抗全世界，也就是說，兩萬萬反對十八萬萬，所懷的唯一希望就是原子炸彈的誘惑。

擺在英國人民當前的抉擇是明顯的。我們不必驚訝於邱吉爾和保守黨反動派之從事於這種不顧一切的失敗主義的冒險行動，他們的伎倆已窮，他們的氣數垂盡，值得特別注意的到是一個工黨的外交部長用了他的行動與言論爲邱吉爾的演講預備了道路，而當他正式否認與這演講有關的時候，他却絲毫無意拋棄在這爲官方一切工具所廣爲昭告於世的演講裏所計劃的政策。（特別是對於德國的納粹，英國廣播公司曾反覆不斷地把這演講向德國傳播。其效果已經證實會引起感應了。）倒反而是他自己的具體政策如此緊密地接近於邱吉爾的主要的路線。這是一件必需加以糾正的事情；因爲英國人民以及英國勞工運動整個的前途都繫於這樣一個外交政策的基本問題上。我們歡迎一〇五位工黨國會議員的行動，他們表示了他們對這問題底重要性的認識以及一致地，實際地拋棄邱吉爾政策，並轉向一個民主的外交政策的必要。

擺在英國人民面前的抉擇是簡單明瞭的：配合着全世界進步人民的進展，配合着蘇

聯，歐洲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殖民地人民，世界職工的結合與工人階段的團結向前走去，不然就是後退，退到成爲美國企圖資本及其英國反動夥伴的奴隸，邱吉爾的聲音就是英美集團最反動部份的聲音，他們懼怕全世界人民和社會主義的進步。他的十字軍不僅來對付共產主義和蘇聯的，絕不亞於使用同樣手段的希特勒的十字軍，而且還用來對付在英國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的進步，他的政策是不僅僅反蘇，而且還反英。他的政策勢必把英國變成美國富翁的擋頭小卒，變成他們反對社會主義世界的戰略上的前哨，以至成爲有計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鬥雞場和罹難者。

邱吉爾高叫着『第五縱隊』，並且還想隱蔽『第五縱隊』乃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機關這一事實，可是這完全是徒勞，英國人民是不要菲爾街的第五縱隊到這裏來的。他們的愛國熱誠使他們堅決反對爲了國內反動的金融巨頭的利益而成爲美國億萬富翁的奴隸。他們尋求與蘇聯以及所有世界進步人民友好和緊密團結的道路，以保證和平，並同時在國內推進社會改革的長期工作。這正是足以擊敗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計劃的一條道路，而朝着這一條道路頭一個不可或少的步驟，就是轉而採取一個民主外交政策，和建立英國工人階級的緊密團結。

蒲恩茅斯會議後的展望

Harry Pollitt 作
湯 生 譯

本文作者波立特是英共總書記，英國工人運動，民主運動的領袖，名政論家。本文譯自去年七月份勞動月刊。

目前勞動月刊的讀者，對於勞工黨在蒲恩茅斯城舉行的第四十五周年會中的討論及決議，該都已明白瞭解。凡參加這次會議的人，都能覺到各代表間那種勝利的情緒；這種情緒之造成，乃由於上次普選中保守黨之被擊敗及現在國內各種建設性之立法法案，這些法案，工黨政府有的已付諸實施，有些在不遠的將來，亦將實行。

這種勝利的情緒是超越一切的印象，同時任何鄭重的觀察者都不能不意識到正有一種危險的趨勢，會使勝利沖昏了頭腦（這主要是由在講壇上的領導人引起的），當會議進行時，領導人竟從來沒有使人注意到這會議即將臨到的日益嚴重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實際問題。根本也就沒有用力來分析不列顛的經濟情況；不論國內的情形或國際間的地位。這一點既未做到，當然更不會有基於實際分析的遠見，可藉之以決定工黨的政

這個弱點不但繼續增進了目前已經存在的幻覺，並且使勞工運動失去警覺，可能使不列顛的勞工階級在將來對資本家的鬥爭失了準備。

在本文中我不打算把蒲恩茅斯會議中的每一點都討論過。我願只在到會者心目中，（不管他們承認與否）成爲籠罩着整個大會的陰影有所論列。陰影早就在那裏了。從代表們開始報到時起，一直到閉會爲止，一直都籠罩着。這是戰爭的陰影。我並不是說另一次戰爭迫近了。而是說有一種出乎本能的恐懼，自覺或不自覺地，怕工黨政府現在採取的外交政策勢必今後數年內引起另一次戰爭，除非這政策能夠改變。

如果，如果是一個保守黨政府執政了一年之後，我們的國際地位一直下降，特別是英蘇關係惡化到這樣危險的地步一如一九四五年七月以來所演變的那樣，那我們很容易想像得到，工黨的領袖們將從羣衆運動那裏感受到何等的壓力。這次蒲恩茅斯會議又將起怎樣一種反應。若把這責任委諸蘇聯政府及其人民，那我們不久就會覺得錯了，而重把這責任歸諸應對之負責的保守黨政府。然而當現在這些情形在工黨執政一年之後出現，不論貝文先生的演講技術怎樣，總無法避免他對現政府的責任。

一九四五年五月工黨在大選以前，在黑池 (Blackpool) 開會時，貝文先生自己承認工黨其時並無意執政，國會議員道爾頓先生 (Hugh Dalton) 對於英蘇關係就會有中肯的看法，他說：「我們不能不竭盡所能，求得蘇聯政府與英國政府，以及雙方的人民大衆間的密切接觸，並用種種可能的方法，來消除雙方的懷疑，即使英蘇關係仍不時爲猜疑及誤解的暗雲所籠罩，我敢鄭重申說，一個工黨政府當遠較一個保守黨政府易於消除這些疑雲。」

你祇要重讀一讀這段話，再想一想目前的情況，就可以明白，工黨政府，對於達爾頓所立下的目標，失敗的多麼嚴重。

如果有人以為我過於跨大了工黨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那麼就只要請他注意一樁極其重要的事實；工黨區黨部（Divisional Labor Parties）的議程上，（這些區黨部相互間具有密切接觸，並且詳細規劃了勞工運動的工作的組織）關於外交政策各方面決議要比任何其他項目為多。這些決議已經因為併入各條綜合的決議而使當初提出時那種火氣與評擊，看起來大大減少了。可是它們仍然表示出關於對西班牙，對蘇聯，對巴勒斯坦的外交政策通盤一貫的性格，反映出各地各處各工廠與勞工組織的深切關懷。

這許多議案經九個人動議，附議及支持，辯論便終結了，可是拉斯基先生（Harold Laski）宣稱他接到了六十六個代表要求發表演說，和另外二十七個代表要對外交政策發言的要求。這是一個空前的六數目。表明了普遍的信任，與疑惑，或者如十位代表所說的，關於工黨勞工政策所存在的『迷亂』。貝文先生的演說並不能消除這種感覺，大家在他結束時所感到的關懷與焦急，一如在他開始的時候一樣。事實上，在較有頭腦或有遠見的代表們心中驚訝程度反而增進了，因為如果說貝文先生的演詞中說明了些什麼的話，（姑不論貝文先生的說話使人覺得工黨政府中只有他一個人還有主張，有見解。）那很明白的，唯一的一點只是他決定盡其所能，加強英美集團來對付蘇聯與歐洲的新民主國家而已。

我要立刻指出若這項政策堅持下去其結果必將是大批的失業和戰爭。它必將造成英國人民的災難，而並非蘇聯人民的災難。自工黨政府執政以來，它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方

向就是與侵略的美帝國主義結盟而反對一切真誠的與蘇聯尋求諒解的意願。

貝文先生在對蘇締結五十年友好條約的提議上玩了不少把戲。其實期限的長短，不論一年或百年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這條約背後的精神與目的。

用了有計劃，用來破壞英蘇團結的一系列的努力，實在是英美集團的真實，但是如果在向法西斯作生死搏鬥之際，非有三國團結不可，否則就消滅不了法西斯，那在爲一般人民利益爭取和平的更困難的問題上，就必定更求三強之間有更加堅強的團結。

當然，面對如世界今日所面臨的這種複雜情勢下發生的各種問題上，難免各人有不同的見解，在反法西斯戰爭過程中，列強的意見就會有嚴重的紛歧。例如美蘇對於開闢第二戰場，就主張儘速開闢而反對英國，後者對戰略具有迥然不同的觀念。不過無論意見相歧多深，這問題歸根結底，還是和諧地解決了。它們一定要得到解決，因爲他們一定要得到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三強之間儘管存在着差異，但祇要大家決心使和平恆久存在，使世界的安全能實現，他們的差異也就都能消除。

自從戰爭停止的時候起，三強間的關係怎麼會變成現在這種情形的呢？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單純的解釋可以說明的，有好些因素應該給予考慮，據我看來，下面這幾項該是主要的原因：

(一) 美英的資本家決沒有想到，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奮鬥過來之後，在今天的國際政治上竟能有如此強勁的力量。他們知道如果沒有紅軍，就不能打敗希特勒，因此而與之結盟；不過他們也希望，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同時也將大大削弱他們最大的敵人——共產主義的力量。不料事實恰恰相反，在整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影響從它所得到的

廣大羣衆的擁護上反映了出來，尤其在捷克斯拉夫、法國、意大利等國，在政治的表決或選舉上，共產黨所得的票數總是在增加。

這個與蘇聯力量的強大同時，是資本主義何以通過英美政府，而重對蘇聯與共產主義表示傳統的敵對的基本原因。這也是何以會有英美集團的原因，與何以借着一「民主」的名義，而陰謀召開個別的和會並訂立個別的和約的原因。

(二)對於代表資本主義最反動部份的獨佔資本的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很明顯的，就資本主義整個言，是減弱了資本主義的組織與系統，這情形看英國大選的勝利和歐洲許多新民主國家的出現就可以明白，它們在國際間的力量正在日益增強。關於這點，對於巴爾幹的國家，尤其是如此，反動勢力受了摧毀性的打擊，而進步的力量已經獲得新的、有力的團結。

(三)美帝國主義者毫不躊躇的決心要爲美帝國主義取得宰割世界的霸權，如德國法西斯所企求的那樣。美國更毫無躊躇的在將來的英美合作上，定要使英國成爲次要的副手。

(四)社會民主派與侵略的美帝國主義之間以反對蘇聯與新世界爲職志的污穢的聯盟，代表垂死的資本主義社會，與新的前進中的社會主義社會間的鬥爭的最後階段。

據我看來，這些便是足以解釋國際情勢演變的主要原因。如果還有別的，無疑他們將因時間的演進而顯露出來。但如果你仔細地讀過英美負責實際責任的政治領袖的演說詞，你不會不注意到他們會處心積慮地布置對工人階級的鬥爭，他們沒有一篇演說詞中，不提起對和平的願望，其實希特勒自己就是這種宣傳的老手。他們也從沒有一

篤演說詞中不反對蘇聯的友誼，不攻擊共產主義，那是被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是反文明的。他們又用盡種種方法要把世界分成兩部份，一方面是所謂進步的「西方民主國家」，另一方面是他們認為神秘的鐵幕後的東歐和蘇聯，而這就是使今天國際情形混亂的原因。英國的工黨政府現在已不復能任意地先微微指費一下蘇聯，一會兒接着又含血噴人地譴責共產主義（他們的真意是指蘇聯）。而不引起國際的動亂與猜疑了。不但在蘇聯方面，而且在許多歐洲國家，因為現在共產黨在這些國家的政府中都已據有了極重要的地位。

你不能否認蘇聯獲得原子能秘密。祇要你記得在追求對法西斯主義之勝利及由此以獲得國際間之諒解及求得未來世界和平之努力中，蘇聯曾怎樣地努力並處何等重要的地位。

某一部份的奧帝國主義者，正在誇稱他們有新型的火箭，可以從奧洲飛至烏拉山。他們又不嫌煩瑣地詳細描寫兩枚新式炸彈，能夠在高到連爆炸聲都聽不見的地方爆炸。而使其中包裝的兩種最兇險的傳染病菌散遍廣大地區。人們自然要問他們到底要向誰使用這炸彈的。

當美國的反動派會不知羞恥地說出他們的信念：「為消滅共產主義而掃盡三千萬俄人，代價還算是低」的時候，全世界有思想的人們便不禁要問，這話後而到底有些什麼？而誠實的工黨支持者，就再也難以政府與奧帝國主義結盟對付蘇聯的政策是正當的了。

在蒲恩茅斯會議上的關懷與焦急是有其由來的。工黨領袖們所受到的鼓掌聲及歡呼

聲消逝，深沉的思索開始成熟時，就國際情勢的開展所示，我們不久該便會看見一個羣衆運動要求改變目前的反動政策。

祇有爭取三強的團結，才能使聯合國組織成功，而保證世界未來的和平。這是目前全人類，尤其全英國人民至高無上的目的。

我不想在這裏把關於共產黨與工黨合併這一問題的辯論詳細講述，這兩黨的合併之所以遭受反對，乃是勢所必然的，我想我是第一個說出——「工黨政府的蜜月不會長存」這句話的人，然而莫理遜先生（Herbert Morrison）在他對共產黨所作不知分寸的、污穢的攻擊時，引用了這句話。我注意到社會民主主義的，莫理遜式的『民主份子』，常常盡狠毒來對付勞工階級中的革命分子，而並不對付資本主義。受到他們最重打擊的人，不是那些大僱主，而是那些用力削弱資本主義、加強勞工階級力量、力謀社會主義得以發展、並獲得權力的共產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仇視，每在經濟繁榮時，愈見盛氣凌人而自以為得計。今天的情勢並沒有什麼新奇，在一九二八年時，這情勢就最明顯，那時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各國，以德、法、英、捷四國為例，就發達到可驚異的程度。使大家不信共產主義，而特別頌揚美國大企業的『社會主義的』美德，甚至把福特主義代替了馬克思主義，這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負擔。到一九二九年這美麗的泡影便被滅了，全世界各地除蘇聯以外都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大恐慌。

共產黨之不能合併入工黨，並不是對共產黨的打擊，而是對那些希望藉工黨政府以求得和平與繁榮的人們的打擊。它也鼓勵了那些反動派，他們老在想減弱勞工的力量，

不容他們改善生活，而正在準備一次新的戰爭。

那些支持勞工階級團結的人，正面臨到一種勞工運動史上從無前例的誣蔑，歪曲，偽造文件栽贓誣賴的攻勢。這種辦法，有一天會使得這些好作者受到相反的結果的。

這種組織了來造成目前的攻勢的性質，正足以證明在勞工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中間對團結的渴望多麼強烈。他們不會看不出，最熱心支持工黨領袖，反對與共產黨合併的就是邱吉爾先生，資本家的報紙，和美洲與歐洲最反動的份子。

工黨領袖們頗預底自滿態度會在他們自己認識之前被破碎了的。他們的幻覺立刻就會被日益增強的階級鬥爭所毀滅，勞工階級的公開的或是暗中的敵人，立即都會被迫的暴露出來。階級的區別也將更清楚，更尖銳地劃分。

蒲恩茅斯會議可以合適地安排在勝利遊行組織起來時開幕，可是它的結果却並不是代表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鬥爭的勝利。

因此反對共產黨合併的決定，不論在現在或將來，都是勞工階級最大的利益所遭受到的打擊。

共產黨現在要做些什麼呢？那我可以立刻告訴那些勸告我們解散共產黨的人。我們決無絲毫可能，會採取這樣墮落的步驟。相反地，我們基於攻擊資本主義及推行社會主義的政策，要盡最大的努力來增加共產黨黨員及其力量。這政策是，不論將來或現在，都於勞工運動及國家有利的。

蒲恩茅斯會議的本身，就是對取消共產黨那種說法最有力的反駁，因為如果它已與工黨聯合，那它會議中的議程，討論，和決議，都將取全然不同的態度，而主持者也決

不能只制定那些祇能招致大批失業及造成戰爭的政策。

我們將傾全力來解決英國所陷入的緊急處境。我們要攻擊物價與利潤的增高。我們要為較高的工資，較短的工作時間與更迅速的復員，並為國有化的成功而鬥爭。為達到這些目的，我們並不是依靠資本家的經營才能，而是憑藉勞工階級的力量與其主動力。我們要全力支持每一保證房屋政策順利實施的措施，但房屋的租金必限於勞工階級能付得起的數目。我們還要盡力支持一切為解決目前糧食恐慌必要之措施，在蒲恩茅斯會議中，這問題竟未受到應得的注意。我們而努力打擊「黑市」，並為農業工人求得公平的待遇，採取澈底的方法來增加英國所必需的食物生產。

在印度及埃及的人民的獨立鬥爭中，我們要與之並肩作戰，促使英軍從這兩個國家內撤退。同樣的，我們要求英軍從希臘與印度尼西亞撤退。並撤回對佛朗哥的承認和對西班牙的貿易。

我們要加緊宣傳，以期剷除英國境內的一切法西斯活動，並警告人民那躲在宗教外衣後面的法西斯危機和反動活動。

我們要無休止地為求得與蘇聯及歐洲新民主國家的和平與友誼而工作，結束反動的與美帝國主義聯盟的政策。這政策將使英國經濟遭受危險，而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戰。

對於那些攻擊我們親蘇的人，我要向他們說，我們深以為爭取蘇聯友誼而鬥爭為榮耀。因為我們知道這一直是最有利於英國的。

我們立刻就開始為我們的政策組織我們國內空前未有的鉅大政治攻勢，在每一個階段都配合着廣泛的，社會主義原則的宣傳，並邀請一切贊同我們政策的人加入共產黨。

27

蒲恩茅斯會議採取了一個反對勞工階級團結的決議，不過團結的主張仍然留在議程上。特爾，新事件，經驗及一切將再度提出這主張，一直等這信念及促其實現的決心，制勝了那些工黨內的反動領袖們。他們保全資本主義的心意是超過了完成社會主義的。

歐洲的選舉

William Rust 著
湯 生 譯

本文作者路斯德是英共中央委員，英共機關報倫敦工人日報的總編輯，名政論家，本文譯自去年七月份勞動月刊。

法國、意大利和捷克的總選，鞏固了共產黨的地位；不過它們還沒有未注定有決定性的改變，也沒有使那一黨派佔有絕對的多數，為繼續民主的重建；在這三個國家內，得成立聯合政府，就法國與意大利言，就是以後政治均勢之維持，能否決定在勞工階級政黨手中，這一問題就有得解決。解決之道在獲得共產黨與社會黨間的團結。

這些，當然都不是通常的選舉，不能以之來與戰前的選舉比擬。那時的選舉都是被資產階級獨霸的，它們千方百計掩飾人民面前的基本問題。而且，每一個總選對於整個歐洲局勢，對於與英美密切聯結的反動勢力與民主力量間，在全歐洲發展的緊張鬥爭，都有重大的後果。

這些選舉的特性，梵蒂岡却已經完全了解了，它在法國與意大利總選投票的前夕，曾感到極度的煩惱，決定插足進來反對左派。教皇庇護士十二世在六月一日的演說，便是對於真正的民主黨派的斥責，企圖驅羣衆走向反動道路，這次的干涉以及得到廣泛擁

護的天主教黨的興起，（它在許多方面代替了原來的右翼黨派）實在是歐洲大陸上政治的新景象，必須予以嚴重的注意。現在，梵蒂岡已成爲歐洲反動勢力，政治上組織的中心，無疑的，他們還想干涉今年秋天極端重要的波蘭大選。

各種報告指陳，各村神父的指使，對於意大利農婦，頗有影響，她們的投票因而大量的傾向基督教民主黨。

這次大選的另一特色。在於其反共攻勢的卑劣無恥，這在法國特別表現的清楚，社會黨與人民共和黨結成了聯合陣營，在意大利就不甚顯著，社會黨的領袖中間，與共產黨團結的傾向要強得多。在捷克斯拉夫，祇成了一股暗流，共產黨與社會黨的團結在二起好的時候就把它防止了。

『經濟學家』雜誌（Economi）見到了這幾次總選的這一方面，描寫那些反共十字軍爲「依舊反自由主義，反動，還是過去曾在希特勒治下，現在仍在法朗哥治下的那些法西斯潛勢力。在法國與意大利，天主教黨主要是以反共份子的姿態來競選的，現在他們背後更有了一批剛抬頭的反動份子，時時在重彈着反共的老調」。

『經濟學家』已很正確的指出這反共十字軍的真實內容，不過我們如果低估了反共的社會黨領袖們的力量，或把天主教黨的跟隨者認爲是一大盲目羣衆的話，那我們就錯誤了。

在法國，站在反共陣營最前面的是社會黨的領袖們，他們比人民共和黨要活躍得多，後者其實往往祇會享受或奪取社會黨所開闢出來的地盤。

全部法國總選的競爭實在就是反共的鬥爭，可是結果却出於那幫人意料之外，競選

結果，人民共和黨成了第一大黨，共產黨雖然失了幾個議席，可是投票人數却增加了，真正損失了實力的是社會黨。這是他們口稱代表勞工階級，實際上却企圖與反動勢力勾結，那種猶豫，動搖，而付出了鉅大的代價。

這結果對於壓迫法國同黨使取這種態度的騎牆派（譯者註指英國工黨）該是件有意思的事。在蒲恩茅斯會議上雷翁勃魯姆（Leon Blum）曾向他的朋友們說起共產黨在歐洲大陸上的力量，並指出選舉的結果及建立堅強政府之可能將決定於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團結。當然，勃魯姆能找出充分理由來反對這樣做法。

不過，無論如何，勃魯姆這篇談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因為他說出了這些選舉的結果的根本要旨，那就是共產黨勢力的增長和鞏固。在法、意、捷三國，它所得的總票數在一千二百萬以上。

共產黨得到的巨大的票數，對於反動派與右翼社會黨領袖，是一種痛楚的失望，他們早就盤算在羣衆間造成右傾的可能了。他們原希望勝利一年以後，大家或許對於反納粹和出賣祖國的奸細的戰爭的教訓，和抗戰的記憶已經淡忘，而過去曾被戈貝爾作爲拿手好戲的赤色恐怖又可以泰然拿來與風作浪了。

反共攻勢的失敗，必然在國際政局上有其反映，貝爾納斯先生與貝文先生現在要使歐洲向後轉，建立一個在英美控制下的強大德國，制止歐洲新的國家經濟與土地改革，使之成爲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定將感到十分困難了。

共產黨的成功代表此次戰後勞工、農民與智識分子的團結及鞏固，這是一塊堅固的界牆，可阻止戰前培養了法西斯與戰爭的、可憎局勢的復活。

法國共產黨之被抑也許可以假定法國將被牽入英美集團，採取反蘇政策，減弱對倫敦與華盛頓親法朗哥政策的反對而取消其反對恢復德國勢力的主張。在法國本身，則反對修改憲法和社會進步方案，重建大托辣斯等主張將因此重又抬頭。

反動派將會乘此總選後的政治僵局而投機，而從中漁利。

戴高樂六月十八日在貝育（Bayeux）發表的演說中，雖說仍主張民主政治，可是很明顯的有着獨裁傾向，昭明彰著地，蓄意要做法國的大總統。法國反動派的頭子們和那些出打共產黨總部的暴徒都將在戴高樂的旗幟之下結集起來。

捷克斯拉夫共產黨的勝利是最出色的，三百個議席中佔了一百十四席，已經成爲全國第一大黨了，他們與社會民主黨在一起，便在新內閣中佔了大多數，共產黨的領袖，高脫華德（Klement Gottwald）已出任內閣總理。

這結果表示，處在歐洲戰略要地，又被視爲東歐間聯繫的捷克，確然地站在民主方面，而將進步地解決歐洲所面對的各項問題。捷克的表決，乃是反對貝文與貝雷納斯的。

左翼在捷克勝利的原由，在於社會黨與共產黨團結的力量，（兩黨之間，有極好的合作），在於共產黨在五月以後所作的輝煌的建設工作，以及羣衆認爲他們前途與蘇聯息息相關的信念，對於蘇聯，他們有極高的愛慕之忱。

捷克的民衆閉目不聽反蘇的宣傳，也不信「西方的民主主義優於東方的極權主義」這種論調。這種論調不能使他們忘却他們在慕尼黑會議上被出賣的回憶，也不能忘却紅軍在爲捷克解放所盡的決定性的作用。

意大利選舉和對帝制存廢舉行公民投票的結果，也是極其有趣的事。這反映出剛從法西斯獨裁下癱過來，而且二十五年未經投票的國家中；各種錯雜的政治潮流。

薩伏哀王室到底走路了。意大利共和國確確實實的成立了。

最後的結果共和黨得一二、七、七、九二、三票，而保皇黨得一〇、七、一、九、二、八四票。差不多全體選民的百分之九十都參加了投票。這是這三國總選中最熱烈的一件事。其熱烈的程度正好與希臘對照。

不過國王恩倍多 (Umberto) 的反抗和保皇黨流血的示威，實在是一種警告，使人明白法西斯勢力之強大，他們後面有一千萬票的實力，意大利向民主前進時，該有二段崎嶇的道路。

反對勢力之主要實力乃在南歐，那裏的農民尚受着舊制度的觀念的影響，不過鉅大的政治改革已經在北方的共和派協助之下發動，以其較強的工業基礎，總能把他們從守舊勢力下解放出來。

這幾次總選的結果，並無絕對性，不論最大黨的基督教民主黨，或是共產黨與社會主義者合起來（占有全票數百分之四十），都不足以組織內閣。因此勢必成立廣泛的聯合政府，這三黨應為達成這一目的而成立諒解，他們併合在一起便可有四二六席，而右翼各黨合起來祇有九〇席。右翼黨派中，顯然是法西斯型的平民黨 (Uomo Qualunque) 擁有三〇席。這是一樁堪予重視的事實。

共產黨有四、二〇四、〇〇〇票，得一〇四席，雖然比較社會黨要少四〇〇、〇〇〇票，可是已經為共產黨建立了一個大黨的地位，在新政府中，定然要佔重要的地位。

按目前各黨派間的關係看來，在法國和意大利，都不見得能建立穩固的政府。更確知的：意大利的天主教黨與法國的人民共和黨都不見得會一直採取民主的方向。

捷克却是例外，因為她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比法意兩國遠為穩定，而政府的領導權却在共產黨與社會黨手中，雙方有深切的諒解，而一切黨派，都為了一個共同計劃而一致努力。

不過在捷克斯拉夫國內，斯洛伐克那一帶却有點問題，那裏天主教的影響極大，而那裏多數黨的斯拉伐克民主黨內却包有不少法西斯分子在內，自從總選以後斯洛伐克已經出了好幾次亂子，內政部長曾發表約有十萬以前有組織的法西斯分子，藉着民主黨的庇護，在選舉時，違法投票。

雖然右翼各公開的黨派在法意競選而獲得若干議席，却並不見表示實力的影響，在法國新的保守政黨自由共和黨（D.R.F.）在一九四五年得了全票數的百分之十五·二，在一九四六年時却降到了全票數的百分之十二·七七。這減少的票數可能是投到人民共和黨方面去了。

這些公開的右派所以遭受民衆的冷落，乃是由於民主的高漲，與歷史對他們所扮演的角色的無情暴露，在他們的領袖人物中，出了好些法西斯黨徒及出賣祖國的奸細。但我們也必須正確估計，在城市與鄉村中的反動勢力自覺地轉而支持天主教黨派的程度，想爲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它們。這是梵蒂岡的支持所幹的好事，它完全不同情那些被吸引到天主教黨派方面的人民對民主的熱望。

這些新的天主教黨派中，一部份代表了反動派想尋求掩飾的努力。另一方面，又表

示了相當大部份的勞工人階級的要求，想在完全破產的舊政來與共產主義所揭櫫的民主道路之間，有一個中路因循之所。

舉例言之，在法國，在人民共和黨下層的抗敵傳統，與領導份子的籌劃戴高樂重新上台，建立集權制度之間，就有着顯明的矛盾。在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並不代表一個和諧的組織，那個黨派實在是十足天主教的，然而却決定投票贊成共和，不願教會的干涉。大部份黨員都按決議投了票。總而言之。這三國總選的結果證實了工人階級嚮往於共產黨的趨勢，也表明了農民中極重要的一部份，也採取同樣的道路。在法國社會黨因為反對工人階級的聯合，並企圖與人民共和黨聯合，而減弱了自己的地位。同是天主教黨派已經成了一種重要的力量，反動勢力藉之而積極活動，工人階級的繼續分裂乃是建立穩定的政府的主要障礙，而穩定的政府實在是完成經濟的、社會復興的迫切工作的必需條件。

不過政治上改變得這樣大，現在已決不可能回復到舊日的歐洲了。貝文與貝爾納斯可以把反動勢力仍然存在而引以自慰，但是他們的政策已決不能在工農與中產階級大眾中獲得任何反響了，因為農和中產階級正埋頭在建設新民主的經濟制度，他們具有決心，要滅絕獨占資本，和大地主與保皇黨。

第二次歐戰勝利後的德國勞工運動

Hans Berger 著 尼銘譯自七月份美國「政治雜誌」

階級意識極其分明的帝國主義者邱吉爾在福爾敦 (Fulton) 演說，以蘇聯佔領區內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德國共產黨即將合併，而對蘇聯政策提出嚴重控訴。對德國工人這種新發展的重要性加以否定而反動的估價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運動的國際意義。假如邱吉爾，這位宣揚盎格羅·撒克遜反蘇軍事軸心以求建立盎格羅·撒克遜帝國主義世界統治的福音的狂妄的帝國主義者，如此痛心疾首的攻擊德國國內工人階級政黨的合併，實足證明他比較美國許多的進步分子，甚至共產黨員更懂得——真是件不幸的事情——怎樣估計這個反帝國主義原動力的偉大潛能。

除開反動份子和它各式的辯護者外，沒有人能希望大家把德國人對全世界人民的一切作為忘掉，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野蠻殘忍及其唆使者與造因的憎恨，我們一定不能冷卻。德國階級自覺的工人也承認了的德國人民的罪過，和他們因此要負担起的賠償之

責，我們也一定不能擱置一旁。所有防範德國人的波茨坦會議所規定的必需的完全策略，一定不能被削弱，除非他們已確鑿證明他們已建立起一個不同的、進步的德國。我們一刻也不能，特別在今日複雜的國際情況下，忘記德國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以及它們的巨大影響和根源——德國金蟻資本雖然削弱了，還並沒有消滅。如果我們看到甚至法國、波蘭這類國家反動勢力也在想反守為攻的話，則相信德國反動力量（不論他們怎樣偽裝自己）已經被消滅或者已經無足為害豈不是件很可笑的事。

必需記住這些事實，還必需認清楚在德國的發展中有新勢力產生，不能像在戰爭期間一樣，繼續以舊的眼光來看德國人。不要忽略戰勝希特勒德國，同時帶給了德國人民有歷史性的重大改變。希特勒德國的垮台，解放了德國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正是遭受壓榨、蹂躪的人羣，他們中間最前進的鬥士慘遭殺害，他們是納粹獨裁政治的第一個犧牲品。

生活的邏輯已經回答了德國工人是否能再起來，及以怎樣的速度起來這問題。誠然，在德國許多不同的地區里，德國勞工運動發展的進度很不平均，大部分德國人依然負着他們不愉快的過去所遺留下來的許多担負，俯伏讓步於極其善變的各式反動者（就中尤以反動的勞工領袖為甚）的勢微之前。但是，德國工人階級顯然已經證明了他們有從過去的課題學習，從他們的經驗中找出正確結論的能力和組織，改組他們自己的隊伍的能力。

事實上，自盟軍擊潰希特勒德國以後，德國勞工運動的發展一方面有世界勞工運動的鼓勵，另一方面却受到國際反動勢力的阻礙。事實終究證明了即使用最野蠻的恐怖手

段，和最『科學的』腐蝕羣衆的方法，也不能毀滅共產黨和馬列主義對工人階級的影響。

雖然有它的錯誤和過失，有它的缺點和不足，在它歷史的過程中有許多曲折——多麼不幸的曲折呵！——有固然該從頭開始的必要，但我們可以確實地說，僅僅在勝利後一年，德國便有了了一個強大的、戰鬥的、比較過去更懂得做什麼和怎樣做的勞工運動。希特勒德國戰敗後一年，我們看到德國的一大塊地方——兩個工人階級政黨合併為社會統一黨的蘇聯佔領區內，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這種改變正是向全世界人民和德國羣衆指出德國問題是能被解決的，並且有其解決的方法的。

在蘇聯佔領區內我們看到什麼呢？

一個聯合的職工會運動產生了，到現在已經包括十八個工業組合，約有四萬會員。在德國歷史上實行了第一次的根本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土地改革。在奧斯特貝恩 (Ostebien) ——易北 (Elbe) 河東之地，容克貴族 (Junkers) 的歷史舞台——容克貴族的土地變成了農民的土地，因此摧毀了大農業資本家的政治力量 and 社會力量的經濟基礎，并摧毀了作為德國反動勢力與帝國主義的永久利器、並且使希特勒得勢的金蟻資本的重要聯盟的德國封建殘餘。這種由沒有土地的、貧苦的農民、農業工人和從外國趕出來的德國人所積極參加實行的土地改革，使工農聯合起來為一個新的民主的德國之建立而奮鬥。這個希特勒的國度及其機構已全部被摧毀了，一個新的民主的國度，以人民自治為基礎的國家產生了。在這個經濟與行政的機構內已完全肅清反動勢力。在蘇聯佔領區內，托辣斯、卡迭爾、大公司和大的私人銀行都不再存在了。所有獨佔性質的經濟機構已轉移到

省、市、鄉政府的手裏。在工廠和職工會裏，工人會議積極參加反對經濟怠工與清算工廠和企業中法西斯分子的鬥爭，并積極參加恢復經濟生產。一個新的民主的制度也已經建立了，盡量推行羣衆教育來根絕法西斯殘餘、日耳曼主義和黷武思想。與此并行的是鼓勵文化和科學活動。在任何一方面，都開始了新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活。在階級自覺的工人領導下，創造了新社會生活的格式以改變德國大多數人民的氣質。

這實在是一種激進的反法西斯的民主。所以稱爲激進的和反法西斯的，是因為它由威瑪共和國和納粹德國地獄統治下那些苦難的、順服的日子裏得到教訓，而由階級自覺的工人政黨起來領導。它不是社會主義，因為資本主義還存在着，雖則這種資本主義由於獨佔資本、容克貴族和舊的反動國家機構之摧毀而大受削弱了。它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爲工人雖然是這新德國民主政體最堅強的領導者，但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黨（正同富農一樣）在政治上有其存在和組織的絕對自由。蘇聯佔領區內的地方政府與行政管理，就表示出工人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的聯合。沒有戰罪，或不會助長過法西斯主義，并願意適應這新環境的僱主，仍然是他們自己企業的主人，雖然他們個人所獲得的利潤要服從復興的總政策和這個新德國民主政體的新社會自覺。這種激進的反法西斯的民主，既不反對教會，也不反對無神論，雖則它堅持民主的政教劃分的原則，以反對教育服從教會勢力的反動企圖，它仍保護着每個公民入教或不信教的權利。

簡言之，這就是在階級自覺的工人領導下，密切與農民和勞動羣衆合作，并與民主的、反法西斯的資產階級政黨聯合所創造的德國。自然，紅軍在其佔領期內，曾以驚人

而有決定性的援助來根絕法西斯主義，并曾鼓勵與實際幫助進步力量。同時，我們一定不要忘記所有這些幫助要不是階級自覺的工人有學習能力，有長期的經驗和工人階級傳統，則目前的成就就不可能得到。德國勞工運動最優良的傳統，加上紅軍的幫助，使德國勞工運動驚人的復甦和奮起成爲可能。這種更生以它的兩個歷史政黨——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終於贏得勞工運動三十年戰爭的教訓這一事實作爲最重要的說明。

一八六三年，菲迪南·拉沙耳 (Ferdinand Lassalle) 組織了『德國工人總會』。一八六五年威廉·李卜克內西 (William Liebknecht 卡爾·李卜克內西的父親) 和貝爾 (Auguste Bebel)，這偉大的工人保護者，共同組織了社會民主黨。一八七五年兩黨合併爲德國社會民主黨，不久便成爲德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俾斯麥與當時德國統治階級，如同今日的反動勢力一樣，對統一的德國工人階級政黨既憎恨而又害怕。這正像目前的社會統一黨在國內和國際間都受敵人責難，認爲它是一個替外來勢力——意指蘇聯——服務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常被稱爲『Vaterlandslose Gesellen』——『無國籍的人們』。

德國勞工運動嚴重的分裂及其一切可怕的后果開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大部分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領袖在德帝國主義壓力之下，公開地跑到帝國主義的陣營裏。這種分裂并沒復原過來，反而因一九一八年後社會民主黨的右翼領袖和大資本家，容克貴族，將軍們攜手粉碎革命民主運動而更加深。故此在一九一八年以後，民主革命并没有完成，代之而起的威瑪共和國，除了保證德帝國主義復活的喘息期間外，一無所成。這分裂的勞工運動，其組成分子相互鬥爭，便爲法西斯主義的攻擊所打倒，並且當了它

恐怖與腐敗勢力的戰利品。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在工人基層內的勢力使疏於戒備的德共無力防止它的禍害，由此引到了德國工人階級的失敗與德國本身的傾覆。

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卡爾·李卜克內西 (Karl Liebknecht)、佛郎茲·梅齡 (Franz Mehring) 和恩斯特·台爾曼 (Ernest Thälmann) 的老伙伴威廉·皮克 (William Pieck)，在合併前德共最後一次會議上對黨作了自我批判，列舉出他們過去的許多嚴重錯誤：

『某種宗派主義與教條主義之發展；對民族特性之極其漠視；對其他階層工人常存的某種傲慢與羣衆脫離關係；尤其是，機械地把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移植到德國來這個傾向。黨的另外一個基本錯誤是領導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後者黨員的這種責任實該由其領導分子的反動政策來負擔的）這一錯誤的最高峯是德共參加了反對布朗·賽法林 (Braunsevering) 政府的公民投票。

『除了這些大家都承認的，非常嚴重的錯誤以外，建立反法西斯的聯合陣線之主要障礙乃是由於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領袖們的反對。即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德國巴本 (Dobner) 政變後他們還是拒絕和我們一起號召總罷工。一九三三年正月三十日，這德國歷史命運所繫的日子，又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除這些缺點與錯誤外，德共曾堅強地完成了下列諸原則：第一、為爭取和平與各國人民的諒解而作反帝反軍國主義鬥爭；其次、對抗反動勢力，爭取勞動大眾的民主，其最終目的在實現社會主義，使之其在國家政策上有決定影響而鬥爭，第三、為爭取

團結大部分工人及聯合農民而鬥爭；第四、爲爭取生活條件與勞動大眾工作條件的長遠改進，反抗剝削與壓迫而鬥爭，我黨有這些革命的傳統，我們應感到驕傲，我們要把它帶到社會統一黨裏面去。」

二

社會民主黨與德共合作，在希特勒德國及其戰爭的可怖的遺物——物質與精神的瓦礫堆中創造出一個新德國是件基本重要的初步工作。之後，兩個工人階級政黨更邁上了有決定性的一步，促進兩黨的有機聯合，而產生了社會統一黨。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一日（正式合併的那天）是德國和世界勞工運動歷史性的日子，從前德國勞工運動的分裂所造成的可悲的創口被彌了縫起來。爲建立一個新的，更成熟的德國勞工運動，兩次帝國主義戰爭——希特勒德國與希特勒戰爭，加上這戰爭所招致的一切驚人破壞和國家主權之喪失，都是必需的。因爲這個新黨所表示的一致性并非簡單地回復到一九一四年以前就存在着的那種一致性，這是德國勞工運動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極高級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基於勞工運動的可怕的經驗，基於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威瑪共和國破產與十二年希特勒獨裁的教訓。

社會統一黨的產生，不僅是上級領袖們簡單地決定下來的。數百萬工人都參加了正反的討論。在報章雜誌小冊子上，在兩黨黨員中間，展開了激烈的理論上的探討，所有過去的經驗，目前的實際工作，德國的未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關聯，新政黨的馬克思

主義性，都要使羣衆明瞭。同時合併的籌備對階級自覺的工人所組織的德國工人與廣大羣衆也是一種開導的，極有效的工作，因此社會民主黨內反對合併的敵人——資產階級與爲資產階級所掌握的領導者們，便不遺餘力地去阻撓它。

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最出色的領袖費希納 (Max Fechner) 在本年四月十三日柏林社會民主黨最後一次地方會議上爲回答黨內反對合併的人們宣稱：

如果現在用言語來分裂我們的人提出社會民主黨的中央委員會是否有權決定政策這個問題，則這問題已經由去年秋天蘇聯佔領區內以民主方式組成的各地方會議一致承認中央委員會是黨的領導機構這件事實回答了。今天的形勢到底怎麼樣呢？毫無疑問，中央委員會登記過六十三萬黨員，而在這六十三萬黨員中只有五千人在原則上反對合併。合併的時候德共有六十萬黨員，其中二十萬五千是在英美佔領區登記的，四月間新的社會統一黨在蘇聯佔領區內便有一百三十萬黨員，二十萬請求加入新黨的還沒算在裏面。且不提英美法區（指英、美、法區）內極大多數德共與社會民主黨黨員都贊同這新黨，單是現在社會統一黨的黨員就比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國全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加起來的數目還要多得多。

社會統一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黨。這即是說，它有科學的社會主義作指導。『社會統一黨的目標，在於消滅所有剝削、壓榨、經濟危機、貧乏、失業、與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這一解決我們重要的民族社會問題的目標，只有社會主義才能達到。』

但新黨在闡明其最終目標是社會主義時，并非不瞭解目前德國的工作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建立起一個反法西斯的堅強的議會制度的民主政體，以不記名投票法選舉國

會，并在多數黨或各黨派聯合領導下產生政府。社會主義者知道工人階級才是德國唯一堅強的民主力量。爲了消滅對新德國的民主、選舉、國會、政府以及整個國家機構的一切危害，爲了像一九一八年以後那樣重新開發經濟，爲了在國內戰勝目前依然強固而且在全世界各資本主義國間還有着強大同盟的德帝國主義，這是唯一的力量。新黨的綱領宣言上說，德國工人階級不能就此超越歷史過程中所必經的民主革命階段。新黨是在列寧著名的教訓『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種策略』領導下的：

『民主革命是一種資產階級的革命。土地的重分配口號或『土地與自由』——這被踐踏的，無知的，但熱切渴望着光明與快樂的農民大眾最廣泛傳播着的口號——就是這一個資產階級口號。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明白，除了資產階級的自由與資產階級的進步這條路以外就沒有，也不能有別的路可以使工農真正得到自由。我們不要忘記目前並沒有也不可能有的方法比完全的政治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工農民主專政更接近社會主義，我們既是進步的唯一的革命階級！——不留留、不懷疑、不回顧的革命階級代表，就一定要盡量廣泛而勇敢地把民主革命的工作呈現在全體民衆之前，並且在這樣做的時候表現最高度的主動性。……』

（國際出版社列寧選集三卷一二二頁）。

加速合併的一個因素是德國民族問題的迫切。社會統一黨如果在爭取激進的，反法

西斯的民主德國的鬥爭中，過低估計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它就不會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會是德國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政黨。新黨在其宣言上如是說：

『社會統一黨實在是一個德國民族的政黨；因為它的計劃是為德國的現在與未來服務。社會統一黨又是一個獨立的黨，它在工人階級中有很深的根基，它是不受一切外力束縛的，并以德國民族之幸福生活為其最高目標。』

因此社會統一黨的領袖們曾多次強調他們以柏林為首都，以魯爾和萊茵區為德國中心這點；他們劇烈地批評了在巴伐里亞、薩爾、萊茵區、漢諾威各地的分離主義與聯邦主義運動，或任何其它地域組織起來的同類運動。因此有些人，例如李普曼（Lippmann）便斥責社會統一黨的領袖們是國家主義者，并且說，不管他們的政治面貌換成什麼樣子，德國人總歸是德國人，他們甚至暗示社會統一黨的領袖也是德帝國主義份子。

德國人將來總歸是德國人這點當然是對的，并且如果德國一天喪失自己的主權，或破裂為若干部分，則德國人民就一天會繼續堅持一個民族的計劃，這個計劃要重新挽回主權與重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由德國人統治，為德國人謀福。德國民族之存在，正同別的國家一樣，是人類歷史發展無可避免的結果。德民族國家之建立是歷史一個進步的發展；但它的歷史的悲劇是由于：（一）在德國建立起一個民族國家遠較法、英、美諸國為遲，（二）它不是經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是經由容克貴族俾斯麥領導實行的德國資產階級與容克貴族之間的反動妥協形成的。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其主要的盟友容克貴族，大農業資本家，把希特勒搬上了舞台，復因後者的野蠻侵略而損害了國家主

權與德國民族國家，他們利用民族問題引誘羣衆贊同他們搶掠的帝國主義計劃，目的卻在於統治世界與破壞其它國家的民族自由與獨立，這一點他們做得相當成功。一九一八年戰敗後唯一能解決德民族問題的階級是德國工人階級，但它沒有能成爲德民族的領導者，來摧毀反動帝國主義的勢力，因此也沒有能保衛德民族國家的存在。現在在一個複雜得多的情況下，這件工作又重新擺在德國工人面前，在一個德國將永遠被國際國內的反動勢力所分裂，德國工人階級運動將被『區化』(Zersied) 這些危險威脅着的時候，在一個只要新德國，新的德民族國家能保證它不再爲害其它民族，便能得到全世界民主力量援助以解決其民族問題的時候——就在這時候社會統一黨號召全體德國人，特別是德國工人們，在革新的反法西斯的民主旗幟下集合起來，因爲這是解決德國民族問題的唯一方法。德國的反動勢力，法西斯殘餘，和仍然強大有力的德帝國主義，還想利用民族問題來妨礙多數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傾向徹底民主政治的陣營。社會統一黨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爲要和他們作艱苦的鬥爭。德國的反動者意欲在德國人民腦海裏深深地保存着一種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以復仇戰爭的勝利，及作帝國主義勢力的 Land sknechte 爲德國人恢復其民族獨立的唯一門徑。反之，社會統一黨是完全依照波次坦會議的，它正確地認定要爲一個徹底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國而鬥爭，并爲國家之主權與獨立與其他而鬥爭。

所以社會統一黨是爲了解決德民族問題而鬥爭的唯一的領導的政黨，這種鬥爭不用帝國主義者與盲目主義者的方法，卻以和德帝國主義者及其基本社會成員（獨佔資本與容克貴族）作不妥協鬥爭爲基礎，把德國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和國際進步，民主人士的

基本利益調和起來。作爲一個階級自覺工人的政黨，它是德帝國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的死敵，並且，在它勢力強大的地方（如蘇聯佔領），摧毀這類東西比起法、英、美三國在他們管理的區域內要成功得多，徹底得多，由此可見德國社會統一黨的政党和法波各國階級自覺的工人政策是不能有很大的差別。特別對於萊茵區與魯爾區的看法，德國社會統一黨與法共之間不會有什麼不同。因爲德國階級自覺的工人們還不能以其在全德國的影響和力量，確實保證新的德國不會再從事侵略，所以法共爲謀法國的安全，要求把魯爾區和萊茵區置於國際管理下是很自然的，這不同於英帝國主義的意見。後者正堅持以這些地方作爲德帝國主義的兵工廠，和英帝國主義政策在歐洲大陸上的跳板，而以促成反動德國的復活爲其主要任務。

四

同時，社會統一黨的影響深入德國其它分區：在魯爾、在萊茵、在漢堡，在所有的工業中心的礦場、工廠裏。在西區，不管反動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如何在路上豎起各種障礙來阻擋，許多社會民主黨的機關裏，組織統一黨的情緒還是一天天高漲。

在這些反動的領袖反對社會統一黨與反對全部贊成組織統一黨的社會民主黨黨員與幹部的劇烈鬥爭中，前者從英國工黨，美國勞聯得到政治、經濟和精神的支持，最後（決非最少），又從西方列強佔領軍當局的政策下取得非常有利的幫助。勞工運動，不論其爲政治的或職工會的都因爲德國被「區」分，受到很大的阻礙，反動的勞工領袖們把

這一點利用到最大限度，這些人爲迎合英美佔領軍當局，集中攻擊蘇聯與共產黨，而反對和德共聯合。

今日英美帝國主義佔領政策的本質是什麼呢？他們的政策是藉右翼社會民主黨，教會以及其它反動勢力之助，把他們在德國佔領的那部分地方變爲反蘇的堡壘。若於此，消除納粹的政策就有『弱點』，摧毀所有德國軍隊與法西斯警察的組織就要『稍緩』，對富有的納粹黨人就存着和解的態度，特別對德國工業家容克貴族，對托拉斯、卡迭爾和大農業資本家要採取友愛的態度。（大家都知道，康菲（Robert M. Coates）先生甚至要對蘇聯佔領區內的土地改革提出抗議）。

這一切的一切自然是阻礙了與延緩了，在英法佔領區內重建工人的政治經濟組織的速度。西方列強不信任階級自覺的德國工人，反而害怕他們，不似蘇聯佔領軍當局那樣給他們鼓勵與幫助。同時，這種形勢鼓勵了德國反動者的活動。就大體而言，他們依然保有特殊的經濟地位，并且，像一九一八年以後那樣，轉而利用西方的『民主』，以不同的面具，重新攫取政權。譬如在巴伐利亞、漢堡、哈諾威和魯爾，萊茵的工業區就是如此。如果控告德國人在其全部歷史過程中從來不曾澈底肅清過反動勢力這點是正確的話，則西方列強現在的作爲實在比德國人尤甚。

雖然處於這種種不利的條件下，英、美、法佔領區的德共，在重建他們的組織上，正在進步中。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因爲黨的機構與領袖比任何其它的政治團體都更徹底地被德國法西斯所破壞，殺害了。在好多地區，他們和社會民主黨合作，在領導着與企圖分裂工人階級的反動勢力的代表作尖銳的思想鬥爭，不論什麼地方，他們都耐

心地和社會民主黨人，和資產階級反法西斯的民主分子一起工作。因為英、美、法佔領區內還不『允許』社會統一黨存在，傾向統一黨的德共與社會民主黨人只好迫得維持着他們原有的分離的特性。

如果工人階級缺乏這種密切的團結與單一的統一黨，對法國這類國家的反動勢力大為有利的話，則在德國尤其如此。從英、美、法佔領區的報導里，可以看出那邊的廣大羣衆受反動思想紛亂頹唐、失望的影響，比在蘇聯佔領區里內要厲害得多。這當然不僅是西方列強佔領軍當局政策所造成的後果，進步工人本身還沒有統一的行動，還沒有按照一個政治與組織的計劃來運用兩黨的聯合力量，為取得德國人民之政治、精神領導及為重新教育他們而鬥爭，這點也很有關係，不論西方列強的佔領政策如何，在這方面完成的某些進步——實在是進步了——還是有的。

希特勒德國倒台後的一年證明了若能實行波茨坦決議，則帝國主義的德國便會走上反法西斯的民主國家的途徑，這才是它真實的基礎。蘇聯佔領區內的發展證明了在全德國範圍內也可以獲致這樣一種效果，只要西方列強肯放棄他們把德國帝國主義（即容克貴族與獨佔資本家）『在民主的名義下』或以『商業』理由保存起來作為反蘇潛力這個觀念。在英、美、法利益中，究竟那一個將統治德國這個問題上，各帝國主義之間各有不同，而這種觀念則已逐漸成為英、美對德政策的領導方針。在英美反蘇的攻勢里，德國不過充當它們的一名走卒而已。

一九一八年以後，聯合了大軍人、大資本家和容克貴族來粉碎德國革命的反動的社會民主黨政策，曾受到國際反蘇份子的贊同與鼓勵。這班人物在戰敗後的德國看到有潛

在的本地勢力可以利用來反對蘇聯。同樣地，今日國際反蘇份子，及其在工人階級階級中的代理者——英國工黨的右翼領袖和美國勞聯的反動領袖們——也在贊助并鼓勵反動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切妨礙在社會統一黨基礎上重組和改革德國勞工運動的企圖。直接統治着德國大部分地方，掌握着數百萬德人生殺之權的西方列強，自能以最危險的方法，利用他們的勢力來防止新德國之誕生，與德國社會統一黨計劃的實現。

國際勞工運動（不是比吉爾之流），尤其是美國工人一定要申明他們自己的獨立政策，這政策關係着德國的命運，并且要盡一切可能幫助與鼓勵德國社會統一黨的原因就在此。這樣一個良好的建立和平進步德國的新的偉大的歷史時機，一定不能讓那些寧可世界往後退的人們破壞。我們不要忘記。希特勒德國傾覆後，現在侵略的美帝國主義便是進歩力量的最大危害，因為他們追隨着一個和希特勒德國世界統治相同的政策。這一政策在勾引着所有反動的法西斯匪徒，而這種人在德國境內尤其多。

美國九月份讀者文萃新聞信

康牧譯

巴比倫之塔

譯者註：舊約創世紀十一章。很久以前，很多人走到了Sumer大平原，他們過去使用着統一的語言，準備在平原上建一座高塔，上達天際，作為紀念。事被上帝發現，把他們分開了，語言也不能統一了，塔有沒有辦法修，混亂因之在世界上出現了。

華盛頓在目前是一個頗為憂鬱的城市，巴比倫當日的混亂情況重新在這裏看到了。主觀，自私，冷淡無情等現象異常的盛行。內政可以說是抓在全國製造商協會和商會的手中。至於外交，一般觀察家則認為全受軍人、卡迭爾和國際金蟻集團的控制。杜魯門是一個中間派。

羅斯福時代過去了，被遺忘了，好像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時代一樣。你看吧！給華盛頓帶來那麼多熱情，智慧和坦白的羅斯福「光輝的年青人」時代，現在是連最後的殘餘都沒有了。

還有一種趨向是大批的官屬精華離開華盛頓；他們能夠在私人企業裏賺到更多的錢，用不着死抱住這一飯碗。政府裏的高級官員拿不到足夠的薪水，政府把自己弄得威信掃地。老羅斯福時代的十字軍精神已經不能復見；他們找不到可以把自己激勵起來的東西，便只好大批大批地一走了事了。

財政部因為幹員的離去而受了最厲害的打擊。自然有很多人根本不理會目前的政治傾向，而繼續留在華盛頓，但他們裏面好些人心目中最大的恐懼也終於得到證實。在羅斯福時代，財政部曾經是一個完成了巨大任務的部門，現任部長斯奈德(John Snyder)却把它變得碌碌無所作為，進入了一種所謂『正規狀態』。斯奈德的稅收政策使得大企業蒙利，小企業和個人企業則受害不淺。所得稅要減輕了。利率政策所反映的無疑是大銀行的利益。甚至連進步財政政策，最後的一點痕跡，斯奈得也正毫無顧惜的，忙乎把它一下剷除光。

壓力下的政府

某些集團施用壓力和『自由企業』無政府狀態的結果，華盛頓又退回到所謂『正規』政府的統治底下去了。美國人民不清楚這些，可以說完全不清楚，這真是一個悲劇。因為大部份的報紙和電台恰好都是為那些以這一充滿了紛亂矛盾的圖畫而自娛的人們服務，有了這些紛亂和矛盾，美國人民就沒有辦法看透事實的真相。街上的市民一點也不知道目前發生了什麼事情。記者們都同意國會是完全控制在全國製造商協會和商會的手中。這裏所說完全控制，是說當國會考慮任何立法的時候，這些組織的壓力有決定性的

力量。至於來自各色各樣的自由獨立公民的和久經閱歷的組織團體的壓力，那是沒有什麼效果的。議會根本就把它置之不理。爲什麼會沒有效果？那是因爲這種壓力太小，來得太晚，而且分散得太薄弱了。假如所有的進步力量真正想形成一種大的壓力的話，他們真應該作得更好，大大的作得更過些。

軍人控制了外交

至於外交方面，大都認爲它並不是受國會的支配，而是受軍人和卡迭國的支配。在本年度的財政支出方面，有七十億元的數目將用來充實陸軍部的活動，其中包括作爲原子能研究和發展的費用五億美元。美國科學家把細菌戰爭研究到這一程度，它的毀滅力量甚至連原子炸彈也望塵莫及。

此外還有一種新的動向。那就是在全世界上建立一個強大的衛基軍隊的美國軍事政變變得更加露骨了。五億美元的數目將用來建立成一支在蔣介石指揮下的中國軍隊，這樣一來，將就能夠在中國發動一個長期的內戰。還有一支新的菲律賓的軍隊也將用美國的錢建立起來，此外還加上其他種種的方法，用來安定菲律賓總統羅哈斯的法西斯統治。

推翻了陸鄰政策

繼艾森豪威爾將軍和前阿根廷參謀總長貝克 (Carlos Von Dan Becko) 會談之後，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里斯，我們的大使梅塞斯密士 (George Messersmith) 又和阿根廷總統倫作了好幾次補充性質的談話。它們的成果無疑的將是華盛頓和布宜諾斯艾里斯

間的密切軍事合作。這位以應艾森豪威爾之邀來到華盛頓而沾沾自喜的貝克將軍，也告訴過他的朋友說，他是因為知道在華盛頓目前軍人最有力量的才到華盛頓來的，他說他又知道國務院最後必定會跟着軍人的意思走的。

不成問題的，在建立一個五萬人的強有力的拉丁美洲軍隊的計劃中，阿根廷將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支軍隊將用美國的錢與武器來供養和配備。一直從巴西駐紮到墨西哥。拉丁美洲人民的意志在這裏是不加理會的；因為在這一政策之下，拉丁美洲人民所看到的不過是格蘭河南面各色各樣的軍事獨裁的更加鞏固罷了。羅斯福以『睦鄰政策』所建鑿起來的友誼的蓄水池，現在被抽得乾涸見了底了。

檢査制度的錢幕沉重地落在拉丁美洲上面，把智利，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秘魯各國的反民主傾向一齊遮蓋了起來。然而拉丁美洲人民都知道巴拉圭的美國大使玻拉克 (Willard L. Beaulac) 是摩林哥 (Moringo) 獨裁政府的靠山。他們又知道是國務院的華倫 (Aure Warren) 把玻利維亞的維拉洛爾 (Villareal) 獨裁政府扶在馬鞍上。他們又知道聯合水果公司因為扶植了那些危害圭亞那諸共和國的獨裁力量，而獲利甚豐。美國的糖業利益和國務院則爬到了海地和聖多明峨兩國內政的脖子上。古巴和墨西哥的較為強大的民主力量則遭遇到着可怕的迫害。

上面一切的一切，歸納起來就等於我們華盛頓和拉丁美洲的記者們所說的：美國在西半球的外交政策不過是為卡迫爾服務吧了。這是『大棒』(Big Stick) 的另外一端。這個大棒已經在歐洲舞動起來，舞的是『對蘇強硬』政策。

這就要由人民來決定了。

上面所說的是華盛頓萬花筒裏面的一些斷片。自然還有其他很多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東西。誰也不敢冒險揣測牠到底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或許就根本沒有一個人知道。甚至你隨便談到它，隨便想一想這一美國人民從未委託任何人製訂過的外交政策有那些什麼部門和最後目的吧，人家就會嚴厲地望着你，向你皺着眉頭。那些有力的集團有辦法叫你識相些，叫你還是不談的好。自然，像華萊士，麥柏，台拉西，馬坎士尼奧，還有另外很少的幾個還能當衆把它揭露出來。但是他們正感覺到：在華盛頓，他們的力量太孤單了，他們又開始感覺到像產業職工大會政治行動委員會和獨立公民委員會，這些組織過於採取守勢了，沒有充分的力量來阻止衝擊的反動逆流。國家正被帶到右的方向走去，爲了不團結，冷淡和效率不足，自由主義份子，進步份子和勞工份子正在付出極可怕的代價。然而最危險的事是進步力量的缺乏領導。現在雖然還不太晚，可是要把反動潮流完全遏止的話，現在就應該動手做了。不然，極端反動派會在投票的地方獲得一黨極多數的勝利的。信仰新政的人似乎理解力都不夠，很難知道目前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一個能夠威臨一切的領袖是太需要了。故羅斯福總統的死給我們留下一個遠超過我們想像的大而深的創口。現在當然還不太晚，但時間却是非常短促的。

這等於謀殺

舉例來說，在未來的三個月里，商品價格將以一九三九年來從未有過的突飛猛漲的

變趨上升。麥子、食物、糧品、五金和各式各樣的其他商品，在歐戰開始以來，即已差不多漲了百分之二百，到今年年底，它們每個還得高漲百分之二十五。至於零售肉價則至少將上漲百分之三十。

食物的價格在明年一個年頭里面將還是很高。十一月選舉前，大家一定會敏銳地感覺到食物價格的突然高漲。那些幫助取消物價管制的衆院議員可能會後悔不該投票贊成全國製造商協會的辦法吧，假如人民知道這些事實的話。

目前阻遏通貨膨脹唯一的希望的標誌和最大的因素是生產量還在提高。鋼鐵生產量增加了。無線電和電工器材正在分配到零售商的手裏去，輪胎生產量差不多可以滿足需要了。汽車生產在今年年底能夠滿足需要的百分之五十。生產終究會把價格重新壓下來，但絕不是馬上。

勞工

罷工：可怕的通貨膨脹的壓力一定會重新帶來勞工的不安。罷工的現像無疑地會增加。工人也一定會想辦法使自己趕上那永遠飛得高高的生活程度。和一天天高漲的物價，尤其是食物衣服的價格一比，他們的工資支票就恰好是變得越來越小。因此罷工的現像只會加多不會減少。

總賬不算了

在漢堡股票交易所裏面，大的德國托辣斯股票又重新走着紅運。這一事件把英國

在這一區域裏面的政治方向最有效地而且最具體地揭露出來了。德國企業家都相信英國的政策是：保護大的卡迭爾，而且對它們的所有主的納粹活動，一點麻煩也不會有。在兩位貝先生（貝文與貝爾納斯）的聯合德國方案裏面，德國大企業早就看透了他們正計劃把魯爾城再度地變成英美保護下的一個兵火廠，所不同的是這次的魯爾工業將為西歐集團服務吧了。

在東部德國的蘇聯佔領區裏面，却是一五四·八二二個農人和工人分得了九千八百四十宗地產和總計四·八五五·〇〇〇英畝的耕田地。這一地域裏面的容克貴族的經濟基礎是澈底被破壞了，他們本來是一向供給德國參謀部所需要的人力的。好些容克貴族跑到了德國西部去。在那裏，英國又把大片的土地捐送給他們，於是他們的地產又得到了重建的機會。

外國的觀察家都相信，只要英國和美國的某些部份政策不變，不出十五年，德國必將再次地以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出現。

金元外交

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慷慨地貸給匈牙利一筆三百萬美元的借款，條件是簡單得了不得。溫和一點說吧，這一公司所需要的是取得匈牙利全部交通專業的獨占和電話、海底電線事業的澈底控制。據報載。這一借款並且獲得國務院的支持。可是匈牙利政府的答覆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不」字，但雖也不能否認這就是我們的外交政策所進行的路線。

戰爭派嗎？

關於華盛頓負責人士目前在談論戰爭這一問題，那些激頭激尾爲大企業服務的『新聞通訊社』近來的態度是越來越坦白了。

一般討厭宣傳的市民，則認爲連一個新的世界大戰這一想頭，都足駭人聽聞和不可思議的事。但我們也應該報導出來；公開地預言未來兩三年要發生戰爭的正大有人在的，他們可能不是政府官員，但至少是有權勢的人士。這些戰爭派的支持者毫不掩飾的說，我們既然獨有原子彈，我們就應該使用它們。他們以至死不屈的熱情爭辯說，我們應該用一切藉口從別的國家身上跨過去，應該一意孤行，不如此，就放棄了美國應有的責任，也有好些人跟我們談過，並不相信對蘇戰爭的不可避免，有好些人就說，看樣子，似乎要打起來。同時，我們也應該記住，軍人正以一切努力加強海陸空軍的力量，而且正以不可計算的金錢用在防禦上面；還有好些有權位的人，則把蘇聯恨到這樣程度，恨不得馬上把槍機扳動起來；所以，假如我們的人民不需要戰爭的話，他們應該發得緊張些，我們再把我們上月所說的話重覆一句：人類從未處在這樣的一個危險的時期。雖然我們認爲正走上畢竟一戰的道路，但我們並不相信兩三年之內會發生戰爭。因此，假如我們要獲致和平，目前整備的趨向必須與以扭轉。

